



世界歷史叢書

日本近代史

〔日〕井上清 鈴木正四著

商務印書館

(世界歷史叢書)

日本近代史

〔日〕井上清 鈴木正四著
楊 輝 譯

(下冊)

商 務 印 書 館

第三篇 总危机

第六章 总危机的开始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 和日本的扩张

第一次大战和日本的执政者 1914年（大正3年）8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英德两国互相宣战后的第五天，即8月9日，元老^①井上馨对

① 所谓元老是辅佐天皇的。对于宣战、媾和、选任内阁总理大臣，以及其他基本国策等重要政务，拥有向天皇或政府提出建议的权能，居于政府之上，为天皇制执政者中的最高长老。1889年（明治22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统治者们害怕议会势力有压倒政府的可能，奏请明治天皇下诏，赐予伊藤博文和黑田清隆（1840—1900）以特别元勋的待遇，被称为最初的元老。不管他们是否居于政府大臣的职位，具有出席内阁会议的资格，可说是处于监督政府的地位。其后山县有朋、松方正义、井上馨、西乡从道、大山岩（1842—1914）、桂太郎和西园寺公望等相继被尊为元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除西乡、桂两人逝世外，还有五名元老，其中以山县和井上最握实权。其后元老的势力，随着“民本主义”的高涨而衰落。1922年山县死，只剩下西园寺一名，干涉政府的情况虽然已经没有了，但内阁更迭时，仍由他独断地向天皇推荐继任首相。1940年（昭和15年）以后，这种习惯虽已取消，但不是由于民主主义的发展，反而是法西斯主义势力抬头，连元老也看作眼中钉。

另外两位元老山县有朋和大隈重信建议道：“这次欧洲大战乱，可说是发展日本的、大正新时代的天祐，日本应该立刻举国一致，利用这个天祐良机，即立刻停止政争，收回为一党一派利益的一切要求，如减税废税等，巩固国家财政基础，和英、法、俄三国联合起来，确立‘日本在东洋的利权’，笼络‘中国的统一者’。”大隈首相和山县元老都“非常赞成”这一基本方针。

日俄战争以后，特别是1907年（明治40年）的危机以来，刚刚确立起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各方面很快就步入了穷途（参阅第五章）。国家财政，输入巨额外资，战后仍继续着战时的重税，并且更加重了，以此不断地扩充军备，支付为统治殖民地每年逐步增大的军警费，极力推行铁路国有，扶植军事工业、化学工业以及其他便于垄断资本赚钱的政策。在元老所谓“大正新政”的1912年（明治45年，大正元年）乃至1914年，几乎已经濒于破产，连支付外债利息也发生困难。贸易连年入超，现金准备额从1906年的四亿九千五百万元激减至1914年的三亿四千一百万元，维持兑换制度也感到困难。苦于重税的中小资本家和

农民以及劳动群众的生活，受通货膨胀政策造成的连年物价上涨的痛苦，愈益恶化了。因而国内市场和膨胀了的生产力相比较，更显得极其狭小而不稳定。1913年（大正2年）有六个中小银行破产，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也濒于破产。1914年（大正3年）4月，大阪的证券、米粮以及三品（棉花、棉纱、棉布）等交易所的机关银行——北滨银行也被迫歇业了。

以这种经济状况为背景，人民护宪的浪潮，同各种减税废税等要求以及对军部专横腐败的愤怒相结合，威胁着专制政府与军部。

虽然想依靠殖民地以补救国内市场的狭小，但又苦于镇压朝鲜台湾的民族抵抗，须开支庞大的军警费。而且日本的“许进不许出”的掠夺政策，也很难使这些殖民地发展为日本的商品市场。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企图寻找机会，进一步向中国大陆扩张，以摆脱困境。1911年（明治44年）秋天，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后，政府在10月24日的内阁会议上确定了下列基本方针：阻碍革命党把中国真正统一起来。当前姑且维持满洲“现状”，以待“对日本最有利而且有成功把握的机会”，再“彻

底解决满洲问题”，即将满洲完全变成日本的势力范围乃至殖民地。在这一时机到来之前，以全力在中国内地树立日本的“优越地位”。

根据这个方针，政府便干涉中国革命，以武力阻止革命波及中国东北，并用各种手段使中国不能建立起共和国。1912年1月底，在“保护满洲侨民”的借口下，派兵一师驻大连，但也没有任何效力，1912年2月中华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不予正式承认，并派陆军现役军官进行“蒙古独立”的阴谋活动。一方面助长中国的混乱，另一方面则尽最大努力攫取帝国主义的权利。因之，加深了日本和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和美、英的对立。在这种对立中，经济实力无论如何也敌不住美英的日本，便依靠它在列强中地理上最靠近中国和在远东拥有最大的军事力量，以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宪兵自任，等待着统治中国的“最有利而且有完全成功把握”的机会。

第一次大战就在这种情况下爆发了。怪不得日本的统治者们，以元老为首，一致把这人类史的惨事认为是“大正新时代的天祐”。的确，第一次大战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深刻的矛盾中救了出来，

给了它飞速发展的机会。事实上，这次大战包括日本在内，给世界帝国主义体制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因而，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对日本帝国主义也不是“天祐”而是带来了危机，这一点在当时日本执政者中有谁曾多少预想到呢？

参加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发展极端不平衡所引起的重新分割世界的战争。在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晚的德国，从十九世纪末叶起迅速地赶上了先进的英国。德国商品和英国商品在世界各处发生了激烈的竞争。在航运方面德国也逐渐压倒了英国。德国企图从英、法手中夺取其殖民地，从俄国夺取乌克兰、波兰、波罗的海沿岸，置近东于自己势力之下。德国以奥匈帝国为属下的盟国，奥匈帝国也想和德国一起控制巴尔干半岛。近东方面，在俄国、英国势力与德国势力扶持下的土耳其，投靠了德国方面。德国和奥匈帝国从十九世纪末与意大利结成了三国同盟。但是意大利对于奥匈帝国，由于后者阻碍意大利民族国家的统一，而且具有敌意；又随着意大利资本主义的发展也开始向巴尔干伸张，因而三国同盟逐渐冷淡了。及至英、德对立激烈化时，

意大利无论是在经济上、军事上都没有与英国战争的自信，1914年8月，英德开战时便宣布中立，其后则加入英、法方面对德奥作战。

英国与德国等三国同盟对抗，为了保持它的既得地位，打倒竞争者，进而从土耳其手中掠夺美索不达米亚和巴勒斯坦，乃在日俄战争后和法俄接近，组成“三国协约”。法国自从1870—1871年战败以来，仇视德国。从德国手中夺取铁煤产量丰富的萨尔地区，收回1871年被德国夺去的亚尔萨斯、洛林，是法国资本家渴望已久的。帝俄在日俄战争以前，曾把西方的英国和东方的日本作为主要敌人，因此曾和德国接近；战后则和日本、英国妥协，在东方和日本分割满蒙，在西方则与英国分割土耳其，打起“泛斯拉夫主义”旗帜，企图置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民族国家于自己势力之下，并夺奥领加里西亚。又俄国的最重要产业部门几乎全为英、法和比利时的资本家所掌握，这一点决定了帝俄和英、法相结合。

以英、德为盟主的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的对立，从1907年危机以后，更加尖锐起来，发生过局部战争多次，终于以1914年6月奥太子在塞拉热窝

被塞尔维亚（其背后有帝俄）青年暗杀事件为导火线，7月28日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间爆发了战争，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第二天俄国也对德国宣战，继而8月3日德国对法国宣战，4日德军想破坏比利时的永久中立，发动进攻，当天英德互相宣战，扩大为全欧洲所有国家都被卷入的史无前例的大战。继而日本、美国、中国也纷纷参战，发展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战。

看到英德开战而兴高采烈的日本政府，借口日本负有日英同盟的义务，要站在英国方面参战，想抓住这绝好机会。英国政府却于8月4日表明英国不希望日本卷入大战，同时并向日本声明：如果威海卫和香港遭到德军攻击时，愿接受日本的援助；又于8月7日为了击毁中国海面上的德国伪装巡洋舰，请求日本出动海军。这正是日本政府所期望的事。

政府立即决定对德宣战。当然日本不是为了英国而战，而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参战。英国政府大为惊慌，乃于14日以“东亚战争，会招致中国的混乱，进而引起全东亚的骚扰，将给英国贸易以很大的打击”为理由，希望日本不要参战，并收回先

前的援助要求。加藤高明外相则表示日本已经不能变更其决定，希望英国同意日本参战。在这以后的日英谈判中，英国鉴于不能阻止日本参战，乃要求日本的军事行动局限于东中国海和胶州湾的德国租借地，并暗示日本参战是侵略主义。日本不同意这种要求，主张保留全面的行动自由。8月23日，以日英同盟的友谊为借口，对德宣战。

占领山东 英国只想利用日本作为自己的工具，这虽然是片面的自私自利的想法，但日本的参战的确是露骨的帝国主义的行为，参战以后的行动，也立刻表明了参战的真正目的。

9月2日，日军一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面的龙口登陆。中国政府声明在日德战争中保持中立，并向日德双方提出希望战斗局限于龙口莱州和胶州湾附近的要求，但日本并未理睬。继而又派一个半师的陆军部队于13日占领胶州湾，11月7日攻陷德军重要要塞青岛。

另一部分日军，无视中国的抗议深入山东省境，10月6日（在攻陷青岛一个月前）占领济南，从德国手中夺取从济南到胶州的胶济铁路，并宣布归日本经营。日本又在提交德国的最后通牒中

要求“德意志帝国政府以胶州湾租借地全部还给中国为目的，将该地无偿地无条件地移交给帝国（日本）官员”，然而日本在夺取了德国的租借地和权利之后，并不把它还给中国。不但如此，日本把山东半岛的德军全部驱逐之后，它的军队仍然留驻该地，并强化基地。

另一方面，日本海军以搜寻德国东洋舰队为借口，进攻南太平洋，10月初占领了全部德属南洋群岛。

英国见此，为了使日本疲劳和加强协约国的对德战线，再三要求日本派陆军去欧洲，并派海军往地中海，都遭日本政府拒绝。到了1917年（大正6年）3月，才派小舰队去印度洋和地中海。这也是以英、法承认协约国对德胜利后将日军占领的赤道以北德属南洋群岛划归日本为交换条件的。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参战的最大目的，是利用这个机会将中国置于自己的势力之下。1915年（大正4年）1月18日，日本以山东派遣军和关东军的武力为后盾，向中国政府提出五号二十一条要求。第一号是关于日本接收山东省内

旧德国权利和铁路修筑权以及其他要求，其目的在将山东省置于日本支配之下。第二号是关于将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南满洲铁路和安奉铁路的权利期限，均再展期九十九年，以及其他将东部内蒙古和南满洲几乎完全变为日本殖民地的各种要求。第三号是独霸汉阳、大冶、萍乡的煤铁事业。第四号要求中国政府宣布不将中国的沿海和岛屿割让给他国。第五号是中国政府聘用日人充任军事和财政顾问，而且日本顾问必须多于其他任何国家的顾问总数。中国警察由中日合办或聘用日本顾问，中国军队所需的军械或由日华合办的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并采购日本材料）供应，或向日本采购。承认日本在中国各地医院、寺院、学校的土地所有权，并承认日本的布教权（意味着进行特务活动的自由）以及其他关于华南铁路权利的要求。

这时中国正是军阀袁世凯实行卖国的独裁统治时期。1911—1912年的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完成了建立中华民国的大业，但是革命的果实却被野心家军阀袁世凯所窃夺。他就任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援

助，实行反动的卖国政策。1913年7月到9月江西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的第二次革命，但终于被他击溃。以后他愈加露骨地反动化，1913年10月逼迫国会选举自己为正式总统，继而解散国民党（1912年8月成立，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领导，反对袁的卖国政策）。1914年1月连国会也解散了，建立独裁制，在帝国主义列强援助下抱着当皇帝恢复帝制的野心。

由于中国的革命被野心家所出卖，这是日本敢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的最大原因之一，这二十一条露骨地表现了日本欲将中国殖民地化。日本曾暗示袁：如果他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就支持他即帝位。袁也心动了。然而尽管他的胃口很大，因为他亲眼看到人民的强烈反抗，也难咽下第五号那样的要求。第五号要求日本对各国也保守秘密，但2月10日已被在袁政府中的英、美代表知道，英国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第二天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召开抗议二十一条的大会。中国的各城市也掀起了猛烈的排日运动。袁虽拼命的镇压，但亦无效。由于这种民族反抗的压力，迫使袁政府对日本也多少采取了强硬的态度。4月17日第

二十四次谈判以后，中日交涉暂时陷于停顿。5月4日政府与元老会议，议决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但其中第五号除保留福建省接受外国投资时须首先与日本协商一项外，其他各项要求不得不取消。

在最后通牒威吓下，袁政府于5月9日接受了日本的要求。这一天被中国民族规定为“国耻纪念日”。过去把日本当作亚洲先觉者而予以尊敬的中国民族革命家，开始认识到日本是比欧美帝国主义更为残酷的帝国主义。

第四次日俄协约 大隈内阁和加藤外相先向中国提出第五号那样不寻常的、使人无法接受的要求，后来又撤回，这种作法，即使从帝国主义立场上来看，也很不高明。而中国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所掀起的强烈反抗，便予反对党以“外交失败”来攻击政府的绝好机会。

大隈内阁虽早已屈从军部，接受了增设两师陆军和扩充海军的要求，但由于内阁在众议院是以少数党的立宪同志会为基础，根本不可能通过增设两师团的预算案。因而政府便于1914年12月解散第三十五届议会，于1915年3月举行大

选，一举而打垮在野党的政友会和国民党，政府党同志会等三派在众议院获得了绝对多数。这次选举中，山县直系、警察出身的大浦兼武（1850—1918）担任内务大臣，尽收买干涉的能事。这次干涉是继 1892 年（明治 25 年）解散第二届议会品川内相干涉大选后的第二次大干涉。同志会的选举费是由三菱财阀供给的。政府就这样制造了在野党的所谓“不自然的多数”。1915 年第三十六届临时会议通过了增设两师团案。

山县等所期待于大隈内阁的事情至此实现了。同时，他们不满这任内阁，尤其是对加藤外相（同志会总裁）关于外交问题不常向元老作报告，认为是藐视元老而表示愤怒。元老们本来就非常讨厌政党，看到大隈内阁具备了政党内阁的倾向，便着手来搞垮它。当时他们用“外交失败”作为攻击的工具。山县和井上认为对抗美国向中国伸张势力，不能单依靠日英同盟。要求政府缔结日俄、日法同盟，特别是日俄同盟；加藤外相则认为无此必要。因此，也加深了元老和政府间的鸿沟。

这种情况鼓励了政友会和国民党对政府的攻

击。在野党在临时议会上集中地攻击二十一条要求的“失败”——认为有不会引起中国人民反感的更好办法，但不是反对这种帝国主义政策——和大浦内相的干涉选举。这时，大浦收买上届议会的政友会议员，使之赞成增设两师团案也被暴露了，结果，大浦被迫辞职（7月28日）。继而主张内阁应负连带责任的加藤外相和八代六郎（1860—1930）海相、若槻礼次郎（1866—1949）藏相三人辞职，内阁因而改组（8月10日）。

改组后大隈内阁的外相为石井菊次郎（1866—1945），他不仅和英国协调，也想方法和法、俄协调。10月参加了英法俄三国对德不单独讲和的伦敦宣言（在石井就任前即已决定）。同时，他对于中国，鉴于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卖国政策和帝制野心的运动日益激烈，乃与英、法、俄三国共同劝告袁世凯延期称帝（10月）。这件事又成为在野党攻击政府的口实。他们指责他关于东亚问题不采取单独行动，而与西方国家取同一步调是很奇怪的。元老、政府、在野党都这样沉醉于帝国主义的竞赛中。1916年（大正5年）7月3日，政府签订了第四次日俄秘密协约。过去的协约日俄